

社会对话的前期探索

——宁夏考察的回顾与思考

陈越光

法国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FPH）近年来因主办大规模的中欧论坛而颇受关注，因为，“这是中欧社会之间第一次举行如此重大和开诚公布的全社会对话，它涉及所有社会职业的各个行业和彼此社会共同关心的所有问题。”（卡蓝默，FPH 主席）。而 FPH 之所以有如此大规模的中欧全社会对话之举，是以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的一系列中欧交流项目为基础的。

我从 1996 年开始和 FPH 合作，合作项目为“农民农业与现代化、世界化”（APM）。当时我担任中国农民杂志社的总编辑并兼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1997 年初，我们就以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农民杂志社、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中国农民企业家联谊会五家机构出面建立“中欧农村与现代化项目组”，我担任项目负责人，还请了杜润生、吴象、刘堪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顾问。几年中，该项目组织了“上百人次的 APM 中国项目成员考察了十几个国家的农民农业，参加了几十次国际会议，几十人次的 APM 国际项目成员考察了中国的北京、江西、山西、江苏、宁夏等地的几十个县，与近千名中国农民、学者、知识分子、公务员、企业家和工人进行了直接的研讨和交流。”（陈越光《APM 项目在中国》2002 年）其中，1999 年 6、7 月间我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副部长谢扬组织的宁夏考察之行，可以说就是一次社会对话的前期探索。十年后来回顾此行，因手头没有当时的记录资料，许多行程细节已不记得，当时也没有冠之为“社会对话”，但组织此行的种种设计和思考却具有社会对话的诸多要素。

社会对话的出发点

提倡社会对话，一个重要出发点是面对“他者”，处理好和“他者”的关系。“只有承认相异性、以他人为镜子才能找到自我，只有成为自我才能交谈、协商、解决矛盾。‘地狱即他人’，萨特曾借用《禁闭》中的人物之口这样说道；然而我在想，地狱在于拒绝别人是别样的！”（米歇尔·苏盖等《他者的智慧》）关于“他者”的思考至少有三个层面，首先是尊重：尊重别人的“别样”，确认这样的“别样”存在即合理。第二个层面是理解：从现象的背后真正懂得别人的“别样”。第三个层面是共同性，今天，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生活在不同社会结构的人往往要面对共同的问题，如何在“他者”中发现共同性，以形成共同行动，这是当前社会对话的重点。

十年前组织 APM 宁夏考察时，此行的设计基本上是以如何促使我们对不同社会和文化“别样”的尊重为基础的。我们认为，这种尊重，在中方主要体现在尊重别人对我们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当外方对我们引以为荣的东西、对我们的成绩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时，前提就是能不遮不掩地让人看，让人问。为此，我们在选择考察地时把允许“充分地看”作为条件，要让考察组的外国人除了会议室，还能够进入农民家庭、能够在各种场合直接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这在当

时不是容易做到的。同时，我们通过外方组织者皮埃尔·吴瀚（FPH 中国项目负责人，APM 国际网络召集人），也向参加考察组的外方成员明确，必须在尊重考察地文化和社会政策的前提下来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即使不能讨论，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做法本身也是一种对话。

社会对话的地点要素

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保护在发生地并向人民开放，而不是像老殖民主义者那样要把全世界的文物都收集到自己的大都市博物馆里，这是现代文明的原则。同样，社会对话的地点选择要力求在对话需求的发生地并尽可能吸纳更多的人参与，而不是像传统的大国主导政治那样把所为“领袖人物”搞异地封闭会谈。我们明确提出过这样的原则：“不走路就没有观察，不观察就没有发言权。”地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由于此前我们组织的 APM 国际网络在江西、山西等地考察都只在一个县的范围内，这次我们决心要在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内，并在多个领域进行实地考察和对话。可以去哪儿呢？如果是商务考察，如果是有投资意向的考察，各地当然求之不得；而我们组织的考察是一种国际视野的观察与思考，是社会对话，在一般地方当政者看来往往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还可能有些风险。此前的考察，基本上由谢扬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申报后获得外事批文，而全国有 700 多个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是《中国农民》杂志的调研员，我选几个县落实并不难。但要在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区范围组织考察就不容易了。我的助理余梅女士在西藏工作时和西藏自治区副主席毛如柏先生有过接触，而毛先生此时已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我们希望能获得毛如柏书记的支持，把实地考察安排在宁夏。

1999 年 4 月 11 日我和余梅飞到银川。毛书记在医院住院，我们当晚就在病房拜访了毛书记。出乎意料的是，毛书记听我介绍后非常有兴趣，认为是对宁夏的支持，对宁夏的干部、群众打开眼界、活跃思维大有好处，还感谢我把考察地选在宁夏。甚至说了“敞开看，放开谈”的话，保证安排好接待工作。他让我们在银川呆几天再具体讨论。但仅仅隔了一天，13 日一早，宁夏农业厅、林业厅、1236 工程指挥部、自治区党委接待处的负责人就一起和我们开会研究考察日程及安排。原来，毛书记第二天就在医院召集他们开会布置了，所以他们是带着方案来和我们讨论的。

1999 年 6 月 27 日考察组一行 18 人到达银川，外方为皮埃尔·吴瀚（Pierre Vuarin）等 13 人，中方谢扬、余梅、新华社记者葛素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何玲、我五人。随后四五天时间里，考察组几乎在宁夏各地区转了一遍，考察了养殖场，农民经济组织，学校，农村合作社，市场，企业，到农户家庭入户座谈在水利工地还即兴参加劳动随机访谈，参观大型提黄灌溉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和沙漠治理工程。FPH 中国项目协调人金丝燕女士在两年后的回顾小结中有这样的记录：“来自 12 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考察团，来到中国西部宁夏。宁夏回族自治区有 85% 的穆斯林居民，属于敏感地带。这次考察过程中，‘食品主权’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与实地考察相关的主题讨论如下：1) 密集生产；2) 农民组织；3) 合作社；4) 农产品国家管理以及农产品市场组织；5) 农村发展与国家支持；6) 构建农业保护体系；7) 六盘山造林工程；8)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9) 农村工业化的构建、结果及其问题。”（金丝燕《小结与回顾：国内外的中国 APM（1999-2000，2000-2001）》，2001 年 10 月）事后在北京的国际会议上，大

家都觉得如果仅仅在北京就不可能涉及那么丰富的问题，不可能有那么广泛而生动的交流、对话。

社会对话的参与者要素

让·莫内曾说：“为什么要联合欧洲？不是要联合国家而是要联合人民。”国家联合，永远是一种利益博弈的选择，只有基于人民的自觉，人的联合才是真正的联合。所以，社会对话的参与者有两个要点，一是相关者到场，二是个人的自主思考和表达，必须强调个人间对话的重要性。社会对话不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对话，而是个人之间的对话。

对于“相关者到场”，我们认为有狭义和广义的“相关者”，狭义理解就是利益关联方，比如劳资双方，比如水资源的共同享有方，比如食品供应链中的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和消费者诸方，等等。而广义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已很难在生产、贸易、环境、安全等公共事务的方方面面划分出那些不是关联方了。在设计宁夏考察时，我们有一个“纵向接触，随机参与”的想法，即让考察组的外方人员从地方当局的最高决策层、部门、地县镇负责人、企事业管理者、一直到普通农民都有一个直接接触和对话；同时，考虑到中方的实际情况，事先不提供问题，不要准备，考察中随机提问随即交流反而是最真实的观点。对于“个人的自主思考”，我们强调两个原则，一是参与者的服务机构、职务、专业等等都只是你的背景，在考察和对话中所有的人只代表自己说话，只说自己的话（看法）；二是“要探头到邻居的院子里看看”，尽量去别人的领域里了解、接受和提出看法，而不是把看到一切都装到自己熟悉的筐子里想当然。

应该说，我们的设计是基本实现的。13 位外方人员来自 12 个国家，有政府官员，学者，专业人士，农民，更有许多是长期从事国际 NGO 工作的社会活动家，像皮埃尔·吴瀚（Pierre Vuarin）有丰富的国际 NGO 工作经验，他协调的国际网络遍布全球几十个国家；像来自巴西的甘地多（Candido）是巴西农业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两年后他成为产生巨大国际影响的世界社会论坛（Forum social mondial）发起人之一；像维克多（Victor）他当时在 NGO 工作，后来成为墨西哥议员；来自非洲的让若（Janeau）是非洲 APM 网络负责人，后来担任非洲农民大学校长；等等，他们对于社会对话都非常有经验。所以，在考察中既可以在集中的会议上开展对话讨论，也可以在随机问答中作对话交流。从中方来说，心态上更多是接待考察，希望把更多的好东西拿出来，希望得到肯定，但在我们设计中“纵向接触”落实的很好，自治区书记、自治区主席，农业、林业、水利方面的厅长，大工程指挥，地县领导，一直到普通农民都参与了，毛书记本人除了两次听我们汇报外，还和考察组全体成员座谈了两个小时。由于领导层的开放态度，所到之处确实为我们的“随机参与、随即对话”提供了方便。虽然因为领导重视，考察组的车队前有警车引导，后有医务车殿后，我们还是几次临时选择地点或临时停车，随即到农家推门而入直接访谈、交流。当地接待的同志都不加阻拦，也无抱怨。记得一次因有人要找地方方便，车队在田边临时停车正好停车处不远有一间破旧的泥房，许多人就敲门进去，里面住着一对残疾人夫妇，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外面上学。他们生活清苦，家什陈旧简陋却收拾得干干净净。考察组的人轮番进屋和他们交谈了快一个小时。那位残疾妇女绣花来补贴家用，临走，大家把她的所有花手绢都买走了。

社会对话的问题要素

今天，社会对话的真正目的不是满足人们的好奇性，不是简单地强调和尊重差异性、维护多样性，而是二十一世纪的全人类不可能再有“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面对共同的挑战，不共同应战就没有出路。所以，一切社会对话都需要以问题为导向。

1999年FPH的宁夏考察，是作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食品安全与农业保护国际研讨会”预备活动，我们对话的主题就是新世纪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是产粮大国，更是人口大国，关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粮食安全不能不首先关注中国。而且，自从1994年底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李斯特·布朗（Loster K. Brown）从日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同步成为77%的谷物需要进口的事实出发，分析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将导致“中国的粮食短缺成为世界的粮食短缺”，并提出到2030年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将大大超过世界粮食市场的总供应量的结论，此后，一个“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一直在世纪末盘旋。因此，宁夏的全方位考察某种意义上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实地观察和对话。在中国西部一个比较落后的省区，从环境治理到粮食市场，从移民安置到农民家庭养殖场，从水资源整合到土地资源综合利用，从农户家的衣、食、住、行到农村金融，从国有大工程到民营制药企业，从各级政府到农民组织，都看，都谈，通过这样的对话来回答“谁来养活中国”。应该说，这样得出的结论比研究论文更有说服力。

1999年7月6日考察组回到北京，7月7日-10日“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食品安全与农业保护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考察组的全体成员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学者五十多人参加会议，现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等都参与了会议的交流、发言和讨论。我们都认为这次研讨会的质量是此前的宁夏考察奠定了基础。